

導演楊曜愷 為同志發聲

對於同性戀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看法。有人認為出櫃很型，有人覺得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個出路，也有人將之視為常態，早已見怪不怪。同志話題沒完沒了，而橫在同性伴侶眼前的問題，亦不止一兩個。香港導演楊曜愷（Raymond Yeung），十五年前接手策劃香港同志影展，九年前完成第一部長片《我愛斷背衫》，今年則攜第二部長片《封面裡的羅生門》再與本地觀眾見面。

對同性題材感興趣的Raymond，坦言還有探索的空間，「很多人都講出櫃，但出櫃以外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挖掘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第一部片《我愛斷背衫》，Raymond小試牛刀，將背景設在倫敦，以三個華裔好「基友」在西方面對的各種際遇為切入點，講華人同志面對的種種眼光及挑戰。來到《封面裡的羅生門》，背景轉移到紐約，一個華裔形象設計師Ryan遇上愛國演員Ning，彼此因為身份問題水火不容。華裔青年自認為融入美國社會，卻因為華人面孔而多番被人踐踏；愛國演員表面有財有勢，嘴邊總掛着國家好就是大家好的言語，然而血液裡膽小懦弱的基因，卻讓他無法活出自我。

兩人從河水不犯井水，到彼此吸引，牽扯出各自的身世背景，而Ryan父母的竄入，兩人說着半鹹半淡的港式英語，也帶出移民二代在外地遭遇的歧視及不平等待遇。

探索身份問題

電影會有這樣的設定，源於Raymond的經歷。「我們在香港出生，也像是在『人家』的地方長大一樣，它曾是英國的殖民地，到後來主權移交，從頭到尾香港人都受外國主流文化影響，我覺得這個題材很有趣。」香港人感同身受，對故事裡的Ryan不陌生，他雖然生在美國，卻始終難以融入美國社會，對身份認同感到迷茫。

「在外國生活，身為一個華人，如果想事業發展得更好，通常要將中國人或華人的身份放下，盡量做到主流社會的要求。」有趣的是，人往往愈想擺脫一些人事，反而愈容易陷進去。「是啊，你通常抗拒某些東西，是因為它對你有很大的影響。」譬如Ryan覺得這個愛國演員很傳統很土，但自己的父母何嘗不是如此。「對一件事物過於敏感或過於自信時，一開始必然會抗拒，但當他（Ryan）發現別人並不覺得這是一件羞恥的



事的話，會突然open起來，通過與這位演員的相處而同時接受自己的父母。」

外國拍片挑戰大

Raymond亦透露，找演員飾演這兩個角色並不容易，「在外國找華人演員很難，我們在紐約、洛杉磯、加拿大都找過。」加上Ning的角色又要兼顧英語跟普通話，人選有限。「華人演員在那邊演戲的機會不是很多，像外國的電視劇或電影，裡面的華人角色都非常單一，通常都做妓女、侍應、黑社會、偷渡者等，很多類型的角色他們都沒法演。」此外，由於國外市場很少出現華人故事，所以在資金、發行方面也遇上阻礙，「他們會覺得沒有太多人想看這種『少數民族』的電影，風險太大了。」

而Raymond偏偏只對華人故事感興趣，「因為已經很多人在拍西方故事，不需要我來拍。」他下部戲計劃回歸本土，挖掘主流社會以外的人事物，像在香港居住的菲律賓人、留訪香港的尼泊爾人等，繼續探索身份認同這個議題。他坦言，資金籌措是最難解決的問題，「你知拍戲一定要有明星才有人看，你要找有名的人來客串也不容易，在美國沒幾個紅的亞洲明星，而沒有的話發行的機會又更少。」

喜獲家人支持

相隔九年再推新作，其間Raymond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了MFA學位，拍了五六部短片，並沒有偷懶。「《我愛斷背衫》是喜劇，拍完後我想嘗試不同類型的電影，就拍了一些實驗性、戲劇性的短片。其實《封面裡的羅生門》我也籌備很久了，從籌錢到剪接，差不多三年時間。」



■導演楊曜愷。

最近，拉美同志電影《俯瞰》奪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，同志議題再被搬出來。「中國的情況有點複雜，內地有很多相關的網站，有很多同志文化的產品，甚至不乏地下同志影片。」Raymond認為中國內地不像大家認為般保守，但社會始終未能容納這個文化。「其實香港也一樣，至今也只有幾個名人出櫃，而他們出櫃是因為事業達到某個高度，算是成功了才走出來。」Raymond說，外國的情況稍為好一點，近幾年有些演員出櫃，像Ellen Page，「她是少數在事業沒達到高峰便come out的演員。」

這也是為什麼他當初會接手做香港同志影展，「香港的同志文化算發展得不錯，我們當年做影展時，很難籌錢，只有幾個企業願意支持，如今銀行、政府部門亦願意撥錢繼續做。」但以同志為題的電影，他依然覺得少，「大家不覺得這是一個冷門的題材，荷里活是製作了不少這類型的商業電影，但裡面的角色都以配角為主，通常是愛情片裡女主角的好朋友之類的角色，真正談到議題的並不多。香港就更少，只有《春光乍洩》這幾部，電視劇幾乎沒有。」

Raymond很清楚這類影片不會受追捧，「英語對白已經讓人卻步。」但令他興奮的是家人的態度改變了，「九年前《我愛斷背衫》上映，家人很支持我，也來看片了，但同性婚姻合法化後，今次家人呼朋喚友一起來看，好像我拍了一部武俠片一樣。」



新戲上場

文：Christy

《命懸一線》 高空歷險記

911之後，世人對紐約世貿雙子塔的記憶只能封印在回憶裡，但導演羅拔湛米基斯（Robert Zemeckis）卻挑戰「不可能」的任務，以數碼技術重構世貿雙子塔，並且把時間拉至1974年雙子塔建成之時，講一個瘋狂的表演家，當年如何突破防線，在110層樓的高空上架起鋼索，「穿梭」兩幢大樓。

電影《命懸一線》（The Walk）取材自真人真事，當年法籍表演家Philippe Petit因極為喜愛踩鋼線，拜師學藝後得知紐約世貿雙子塔即將完工，立志要在1300呎高空上走一回，一圓夢想。看似簡單的故事，但在雙子塔已不復存在的當下，如何呈現兩座大樓及1974年的紐約面貌，並不是易事。而且，如此單薄的「經歷」，要拍成電影，亦十分考驗導演的功力。

然而，《命懸一線》的高完成度，實叫人眼前一亮。電影找來英俊小生Joseph Gordon Levitt飾演Philippe，他在電影裡必須表演踩鋼線、耍雜技等高難度動作，更同時模仿Philippe的法式英語發音，相當具挑戰性。據聞，為了拍攝電影，Joseph與Philippe見面，並跟他學習踩鋼線。當年Philippe出於熱愛而踏上這段亡命旅程，他不將之視為雜技，而是一種藝術，一種對美的追求。電影則參考Philippe撰寫的回憶錄《To Reach the Clouds》及奧斯卡得獎紀錄片《Man on Wire》，重塑其過去，交待他如何從小學習踩鋼線，如何得到亦師亦父的羅迪爸爸的真傳、學會固定鋼索、踩鋼線等技能，並進一步透露他如何遇到幾個夥伴，大家憑藉信念，一同完成驚世之舉。

《命懸一線》呈現出來的細節比想像多太多。當初看到預告，難免有「踩鋼線橫過雙子塔會否太單調」的疑惑，事實上電影除了關鍵的高空演出外，亦有很多支線，如Philippe如何克服最後兩三步，如何將雜技演出昇華至一門藝術，甚至Philippe隨着演出時間逼近而呈現的精神崩潰狀態，而眾人又如何魚目混珠，潛入雙子塔裡，偵查兩座大樓的細節，條理分明地安排好表演當日的流程等，緊張程度絕不遜於懸疑片。尤其是最後一晚，大家分工合作，猶如與警衛捉迷藏般，一時要潛伏在升降機槽好幾小時，一時又要在爬到大樓邊緣固定鋼索，已讓人提心吊膽。而表演踩鋼線時，配樂的置入，無疑更令氣氛緊張。

值得一提的是Joseph這個靚仔，不僅將主角的情緒、言語舉止掌握到位，由於他熱愛法國文化，更將Philippe那口法式英語模仿得極為傳神，為電影加分不少。

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阻止兇案 還是改變未來

湯告魯斯的《未來報告》（Minority Report）距今多年，忽然以電視劇的形式出現，並成為戲中預測兇案的其中一個先知，對於影迷來說，是一個未完成的延續。

電視劇《Minority Report》在流出試播集後，於九月正式首播，第一季預定八集。故事接續電影版，描述罪案預防系統被廢除後，三位先知過着平凡人的生活，然而當中能力略遜的Dash仍被不時看見的兇案片段困擾，他無法忍受自己對兇案的無能為力，於是離開姊姊前往城市，企圖阻止兇案發生，多次失敗後，Dash找到不得志的女警探Vega，並開始與她組成聯盟。

電視劇其中一個有趣的地方，是關於自由意志的探討。電影版把三個先知困在系統裡，讓他們成為預測的機器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完全喪失自由意志，只能成為系統的一部分。電視版卻深入建構Dash的心理，把他面對兇案的沮喪，和主動再次預測兇案以達到救人的目的呈現出來。自願與非自願，便成為意志的明證。

《Minority Report》的時間設定在2065年，所有公眾場合都被安裝了監視器，每個人的生活都被記錄，出入哪裡，作息如何，在攝錄鏡頭下無一遺漏，於是自由便成為悖論。與影片另一不同的是，片中將會犯罪的被捕者往往一頭霧水，但他們仍得為自己未有機會做的事付出代價。劇集為了阻止兇案發生，兇手往往已在策劃中。

但我最感興趣的，是試播集裡Dash的孿生哥哥Arthur失蹤，並在結尾傳來求救訊號，正式播出時Arthur卻成為了富豪，並適時給予Dash協助。這是平行時空？還是被改變的未來的未來？



觀影記趣

華語紀錄片觀後談

文：張錦滿

采風主辦的華語紀錄片節來到第八屆，愈趨成熟，除放映兩岸三地佳作之外，還舉辦講座、訓練營，提升新人製作技巧，用心良苦。

去年我看了《學習的理由》，導演是十四歲的台灣初中生楊逸帆，他跟香港觀眾見面，回答提問頭頭是道，看來拍攝影片讓他也成熟了。

今年，我看了傅榆的《我在台灣，我正青春》及李惠仁的《蘋果的滋味》。前者講內地女生蔡博毅到台灣讀大學、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經歷。她是第一批到台灣讀大學的陸生，並在「人人網」上分享在台灣的所見所聞和生活感受，吸引十萬讀者追看。聯經出版社將文章結集成《我在台灣，我正青春》出版，後來上海三聯書店更推出簡體版。蔡博毅後來競選淡江學生會主席，在台灣掀起爭議。

蔡博毅的經歷引起台南藝術大學畢業生傅榆的興趣，經過多次接觸，終獲得本人肯肯拍攝紀錄片。我問傅榆攝製隊有多少人，她說只有自己一個，真被嚇倒。

蔡博毅後來參加淡江社運團體，跟團友混熟，參與當地抗議運動。同學常提醒她，外地人參與

抗爭，會有難以估計的後果，而她則先站在外圍，慢慢走到前線。攝影機追蹤了兩年，片長60分鐘，頗為完整地交待其參與台灣社運的過程。她現時已轉到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，傅榆仍貼身跟隨她，大概拍到她人生另一階段，《我在台灣，我正青春》會有個90分鐘的版本。

蔡同學臉孔圓潤有親和力，而她參與台灣社運，有見解亦有實踐，能引起大眾關注。影片已放上youtube，但台灣以外地區卻未能觀看，這是為了保護蔡同學的舉措。《我在台灣，我正青春》具商業吸引力，將來在電影院放映，必定有人購票，正如很多人會買她的書來讀一樣。

而李惠仁導演的《蘋果的滋味》乃大製作，從台灣《壹週刊》於2001年5月31日創刊開始，講到2012年10月，黎智英想賣盤撤出台灣。該片前後耗時三年多，李惠仁還不想完工，然而出資的公共電視不容許他再拖下去，他才交出現在的118分鐘版本。

台灣各界一直喊黎智英滾回香港，影片則藉查



■《我在台灣，我正青春》劇照

傳媒進駐台灣，讓大家看到台灣新聞業界的問題。台灣經濟差，新聞從業員多抱着「有奶便是娘」的心態，今天打東家，其實想跳槽到西家去。業界生態不健康，講道德、談理想，多屬空話。

黎智英失敗在自信心太強，沒領到執照便花巨資成立電視台，到領了執照，卻又不能「上架」，進入不了有線電視網絡。這部可在網上免費看到的兩小時錄像，剖開台灣傳媒核心，也展示近十二年來新聞業的風風雨雨。